

对中国大陆工业设计现状的评估

（为中国改进创新性产品开发设计教育建言）

作者：骆南植

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洛杉矶学院

近现代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新中国经济模式的演变

中国在大清时代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占全世界33%；鸦片战争后欧美采用现代技术而中国没有及时转型，因此开始缓慢下降。但是客观地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主导的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确实有过举世公认的成就。尽管国民党人以及“文革”时期“四人帮”集团竭力否定晚清政治经济改革的进步意义，国际主流社会公正的历史学家、以及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新一代历史学者，都是给与肯定的。到了大清时代结束的19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占全世界25%。“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段38年的时间里，由于国民党先后发动了针对大清、北洋、中国共产党、台湾本土人士等非国民党政治派别的十多次内战（平均每隔四年发动一场内战，堪称“内战内行”），及国民党内部各派自相残杀，导致日本入侵，蒙古领土丢失，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遍地的饥饿导致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根据国际主流社会历史学家估计为一亿人口），以至于1911年到1949年的38年间，中国人口没有增长。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济在农业方面，事实上已经倒退到明朝崩溃、清军入关收拾残局时的破败惨景；在工业上自清朝晚期“洋务运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几乎全部在战火中毁灭；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份额直线下降到5%左右。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把统治大陆期间搜刮的700万两黄金“国库”（除了象征性的6000两外）全部运到台湾，造成中国大陆一贫如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艰难困苦的经济恢复工作至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两个基本模式，分别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目前正在试图开创第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学习苏联但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模式”。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严格地说来，是一种在38年内战内乱的废墟上恢复正常的补救性阶段，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是集中一切财力，恢复经济秩序并且保障人民大众最低限度生存需求，特点是全国君臣上下一体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大量出口纺织产品、农副产品，换取外汇进口机器设备，建设基础工业。新中国开国国父毛泽东先生带头使用补丁加补丁的旧内衣，“南京路上好八连”官兵服装“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这种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的典型。这样的恢复时期需要高度集权的国营体制，参考苏联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由新中国开国国父毛泽东先生等老一辈领袖所开创。在中国经过伪“中华民国”38年战乱，人民一贫如洗的客观条件下，新中国政府“用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治乱世用重典”，通过“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等雷厉风行的政治运动，清除了制造伪“中华民国”38

年战乱（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祸国殃民的“反动会道门”黑社会政治暴力团伙，通过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清除了伪“中华民国”战乱时期造反起家、扰乱城乡正常经济秩序、巧取豪夺、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土豪奸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有限的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重点建设某些近代化基础工业设施。这个模式的功劳是完成了中国经济的战后重建，保障了“民国”战乱劫后余生的各族苦难同胞的最低水准生活。它的局限性是人民付出了长期低收入、低福利、低待遇的代价。新中国开国国父毛泽东主席通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政策，消除了创建第一种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制计划经济的阻力，终于完成了战乱结束后成功重建国民经济基本设施的艰巨任务。这个模式用来恢复经济、实行社会变革、在社会上恢复正常的法律与秩序、让全体人民过上低水平温饱生活方面可大显神通，至于根本性地改善人民生活或建设创新型经济，则存在许多力不从心之处。苏联由于无法走出类似模式的限制、实行转型及大量浪费国家资源争夺世界霸权的军备竞赛而亡党亡国。中国坚持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稳定压倒一切”的基本国策，实行经济改革而安然无恙。

第二种模式是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模式”，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等执政党第二代领袖所开创。在使用第一种模式初步恢复经济，建设了基础设施之后，中国经济通过大量引进外来资本和中低端技术，开始同国际接轨，并且在30多年时间里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占全世界15%。这个模式的功劳是完成了为中国积累大量外汇，创造一大批成功的大型国营企业，及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富豪人士，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目标。它的局限性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节与微观监控均过分微弱，过分放任自流，执法不力，造成少数私营企业同黑社会及腐败官员勾结，利用各种不成文的“潜规则”巧取豪夺，损害社会大众公共利益，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上贫富悬殊，矛盾重重（围绕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等现实经济利益问题），影响国家长治久安（广东鄒坎村大规模的群众闹事事件，海外华人中敌对势力所控制的中文媒体大肆渲染报道，唯恐天下不乱，应当给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敲响警钟），环境污染极端严重无法持续发展下去（75%河流严重污染、食品有毒）。这个模式用来积累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原始资本方面可大显神通，至于根本性地改善人民生活、建设长期稳定和谐的社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或建设创新型经济，则不仅很难有所作为，甚至已经到了必须全面转型的关键时刻（目前，由于多种复杂的国际原因，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内，越南、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将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在采用这种模式发展经济中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者，并因为国际格局的变化，获得欧美先进国家的认同与配合）。邓小平通过实行政治上“稳定压倒一切”、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开明的务实政策，消除了中国政府体制内部可能存在的对于创建第二种模式、实行改革开放的阻力，同时惩治了社会上各种企图乘著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问题颠覆现政府、复辟“中华民国”的敌对势力，终于获得改革的成功。

第三种模式从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出“科学发展观”关注工业产品的创新设计等重大事件开始，至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我认为，加快这一模式的成熟，是当务之急。这种模式将是对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模式的大规模的改良与升级。除了继续坚持第二种模式中

行之有效措施外，第三种模式必须加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节与微观监控，加强对工人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保护，加强环境保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逐步规范企业行为，消除制造腐败温床、影响社会稳定的“潜规则”。第三种模式应当以建设创新型经济为目标，以培养、使用人才为基点。沈阳市实行人才第一方阵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我认为，创新型经济包括多个内涵。除了沈阳市前市长张行湘先生提出“以沈阳装备来支撑‘中国制造’”外，沈阳市可以在一般消费者使用的工业产品开发设计与相关创新教育方面成为全国模范中心基地。洛阳市可以参考沈阳市经验。工业产品的创新型开发设计一般可以包括三种形态：

- **高端创新：**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研发新材料、新工艺、新部件，带动新产品的研发；这一种模式需要大量投资与科研，获取经济效益的周期比较长；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实力只能勉强做到（但是必须在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及私人企业家文化心态根本转型的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且需要大规模花费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从欧美先进国家引进大量科技与设计人才并购置大量先进设备才有可能；因而并非易事）。
- **中端创新：**以中国目前所拥有的、为台商和外商加工制造产品的机器设备为基础，聘请欧美先进国家产品开发设计人才，举办各种特别培训班，提升中国现有工业产品设计人员的创新设计能力，改良中国目前的工业设计教育学制，就可以在花费较小的投资的条件下办到。
- **低端创新：**鼓励私营企业家分门别类组成创新联盟，每家投资一定资金支付合理费用，同海外创新开发人才团队合作，在海外就地调查市场并开发设计新产品，然后在中国生产并直接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市场。这个做法投资少，见效快，可以直接绕过为外商加工零部件这道门槛，生产创新性产品直接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市场（或者干脆集资开办自己的跨国连锁超级市场），避免中间盘剥，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唯一的代价是必须解放思想，做好直接地同国际主流社会正常实践完全接轨的精神准备。

中国创新产品设计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出“用十五年时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美国华人学者杨振宁博士说：“一个不重视工业设计的国家将成为明日的落伍者”，“21世纪是设计的世纪”。美国教授罗伯特·汉斯说：“今天企业靠价格竞争，明天将靠质量竞争，未来靠设计竞争”。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各地大专院校培养了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设计专业毕业生，为提高中国的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水平，推动产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发展，早日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策目标，打下了一定基础。某些中国企业的产品，如海尔冰箱，联想电脑，已经成功地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市场。但是就整体而言，要让中国大多数产品已经成功地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市场，还需要付出大量的代价。

本人最近一段时间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工业产品开发设计及大学工业产品设计专业教育现状的文章。同时，本人还访问过北京、沈阳、上海、深圳等地的工业产品设计公司网站。本人所得到的基本印象包括：

(1) 在大学工业产品设计专业的设置与教育质量方面，中国目前在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方面尚有可以考虑改进的空间。具体地说，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大学工业产品教育所注重的主要是外观的造型设计（“外观设计”），而在产品的功能的创新或改良方面（“创新设计”）则尚待根本性的提高。

(2) 中国设计产业发展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在外观设计方面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就产品功能设置的创新性而言，尚有可以考虑改进的极其广阔的空间，或者更加直截了当的说，尚未走出简单模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正当冒仿）的阶段。

(3) 社会上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家不仅满足于为外商做简单加工制造零部件或生产初级产品，缺乏对自行开发设计创新型产品的兴趣，甚至于即使有兴趣，也时常抱有“空手套白狼”的奸商心态，想方设法骗取设计师免费劳动。此类新闻在中国国内网站上比比皆是、时有所闻，对海外人才的政治影响均十分恶劣。当然，有远见、愿意为设计师支付合理设计费、甚至资助研究工作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很遗憾的是，开明的人士仅占少数（我在洛杉矶地区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企业家中，至今为止尚未见到）。事实上不可否定的是，根据中国政府有关方面透露的信息，最近十多年来，回到中国创业的“海归”人才成功者不足25%，在艰难困苦中继续孤军奋战者大约25%，完全失败者竟然高达50%，令人触目惊心。某些人主张中国政府增加财政投入给与补贴。我认为这种做法指标不治本。

“海归”人才完全失败率高达50%，原因包括：(i) “海归”者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无法同国际主流社会接轨的“镀金”人士，自身素质不高；(ii) 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待遇方面除了极个别情形外，大多数情况下大大低于国际主流社会标准，而对于引进人才的要求和期望却大大高于国际主流社会（比如动不动写上一句“在国外名牌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构主持重点项目”的要求，符合者实属凤毛麟角，有实际相关能力但是没有这样经历者只能作罢。某些人为了被引进，只能编造经历，造成“学术腐败”。(iii) 相当数量的土豪式“企业家”不仅不愿意为创新项目支付合理费用，往往大搞“空手套白狼”，千方百计巧立名目骗取设计师免费劳动。严重损害“海归”者合法权益。当然，极少数“海归”依靠“公关”，价值100万美元的设计项目竟然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拿出500万美元经费，这样的腐败也听说过。

(4) 某些设计公司喜欢玩弄技术术语，故弄玄虚，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并将设计的经济效益夸大到超越实际的可笑程度，比如宣称在设计上花费1美元可获得1000美元利润回报等（实际上通常大约在10美元至20美元左右，最多可能达到100元左右）。因而败坏了设计界名声。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些设计公司宣称有能力精确预测某个产品设计所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事实上，这种预测只能是“大概的估计”而已。这类问题或许同中国目前学术界所存在的“学术腐败”问题、以及企业界中存在的“急功好利”的心态是形影相随的。

(5) 某些设计公司设计水平一般，但是收费却高于美国本土设计界。

(6) 某些设计公司设计水平不够专业化，甚至没有独立的网站和设计作品展示，没有联系用的电子邮箱。更有甚者，有的公司竟然把“工业设计”的英文翻译成“Industry Design”。正确译法应当是“Industrial Design”。两者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我曾经发去三封电子邮件建议改正，竟然没有回音，也没有改正，看来已经关门大吉了。

(7) 某些设计公司大搞欺骗宣传，宣称某些国际主流社会跨国公司是它们的客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弄虚作假。事实上，国际主流社会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拥有自己的产品开发设计部门，甚至基本上不会请专业设计公司代劳（少量的咨询服务是可能的）。专业设计公司的客户一般是中小企业，这类企业资金有限，而专业人才工资高昂，无法为了几件产品专门设立独立的设计部门，只能让专业设计公司承包。

(7) 闭门造车。如果想要让自己的产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市场，就必须首先对各国现有产品进行全面调查，然后设计出更加完美的产品。虽然许多外国产品可以在中国买到，但是，并不是所有美国产品都可以在中国看到。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同中国接触、到中国投资设厂或请中国厂家生产零部件的美国企业，占美国所有有关企业的总数大概不到50%。目前美国企业有从中国撤退的趋向。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难于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市场，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闭门造车”，在国际主流社会中缺乏设计开发方面的合作者（这种合作者必须身居国际主流社会地区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德国、法国、瑞典等。非常抱歉的是，我必须打开天窗说亮话，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大陆目前的“人才引进”政策在这方面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中国可以考虑直接在欧美设立设计开发公司，或者同现有设计人才及其团队合作）。某些海外华人企业家把人才当成廉价商品，拒绝在报酬和利润分享方面同国际主流社会开明进步的企业实践接轨，幻想用低廉的代价，提升产品设计水平，就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大愚若智，可笑至极。在文化和专业能力上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新设计人士可以同中国企业家合作填补这方面的真空，同各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各类科研院所和科技开发机构、国家级工程和技术中心、国家级检测中心合作。由于中美两国之间政治、法律因素，这种合作必须而且也只能是建立在绝对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范、双方在行政管理上各自独立自主、在业务往来上平等互利、双赢共荣的基础上，做到对各方面个人、集体、国家都有利而无害。

上述问题需要引起中国政府、大专院校、和企业界有识之士高度重视，制订必要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保障有关各方合法权益，惩治奸商和欺诈行为，消除腐败现象。

为中国改进创新性产品开发设计教育建言

在同来自中国沈阳市和洛阳市的朋友们探讨后，我认为：

(1) 沈阳市和洛阳市可以考虑超越目前中国大专院校工业产品设计专业中过多注重外表的装饰、在功能的创新方面尚待提升的阶段，直接同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做法接轨，让

属于美术学院的工业视觉产品设计专业同属于机械电子工程学院的相关专业联合办学，使产品创新教育同国际上跨国大公司的实践完全吻合，并且实际设计出一批重量级的、多功能的、环保型的、利润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产品。

(2) 沈阳市和洛阳市可以考虑设立“中国全国工业产品设计创新资讯中心”。该中心的功能可以包括 (A) 收集全世界各先进国家每年出版的工业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方面的图书资料 (每年所需经费大约为5万美元)，(B) 收集全世界跨国企业每年开发的最优秀的工业产品，及包装、广告设计样品 (每年所需经费大约为5万美元)，

(C) 以上述材料为基础，开展同国际工业产品开发、设计、创新潮流有关的研究，并定期举办面向全国各地工业产品设计专业教师、设计师、企业家的报告会或专题讲座 (每年所需经费大约为5万美元)，(D) 定期邀请海外学者讲学 (每年所需经费大约为5万美元)。该项目可以采用中央、省、市政府出部分资金，同时动员社会上企业家捐款成立基金会的方式来支付一切费用。如果洛阳市对此有兴趣，本人可以进一步出谋献策。

(3) 可以考虑以河南省和东北三省为试点，以工业产品设计、包装装潢设计、广告设计、市场推销、机械部件设计、电子部件设计、材料科学与工程、电脑辅助设计与制造等相关课程为基础，设立高度专业化并且跨科系合作办学的两年制社区学院，在课程设置上采用世界上最先进做法，并根据中国国情有所突破。两年制社区学院为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杜鲁门总统执政期间开始推广的民主化与平民化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美国对世界高等教育历史的一项创新。上个世纪初，为了扩大人民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建立了以社区学院为基础的专科教育、以综合性大学为主的本科生教育及以少数研究型大学为主的研究生教育的三位一体的公立教育体系。其中，两年制社区学院在二战之后发展迅猛，学费极其廉价 (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州，本州居民包括永久性合法移民、及在本州高中就读过三年以上的非法移民，每个学分注册费只有36美元，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下5个小时工作收入。每个课程一般为三个学分)，低收入者完全免费，实行“有教无类”、几乎不考虑入学资格，小班教学，教授直接授课，质量优良 (学分为大多数四年制大学所接受)，大大地消除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提高了全美国人民的创新技能。目前美国设有一千多所社区学院，有将近半数的美国应届毕业生选择二年制大学作为他们大学生涯的起点。社区学院使美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走向普及化。在开设培训新技术课程方面 (如工程设计立体造型与平面制图、电脑动画、电脑辅助制造技术等)，社区学院的课程设计和教学质量往往比四年制大学更高。二年制社区学院的学费不仅便宜很多，而且大多数修读的学分可以转入四年制大学。在很多州，法律规定了四年制公立大学必须留出一定的学位给从二年制大学转学的学生，否则会危及三级公立教育体系的正常运转。在有些社区学院，学生可以修完四年制大学第一、第二年级的所有课程并直接转学到四年制大学第三年级。学院提供两类课程，一类是可以转到四年制大学继续求得学士学位的学术课程。另一类是帮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毕业后能直接找到工作的技能课程。社区学院制度的确立是美国在上个世纪在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方面迅速超越英国等老牌世界强国的重大因素之一，也是美国教育机会民主化、平等化的重大成果。社区学院制度的确立，在美国各阶层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开明派组成的、以美国民主党和工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进

步联盟在消除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缓和社会矛盾、建设真正自由民主的、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美国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所起到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西方各国并不缺乏名牌学府，但是美国伟大的社区学院制度博大精深，为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根基。美国《侨报》2014年9月27日A6版以《从社区学院走出的美国名人》为题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迪斯尼乐园创建人瓦尔特·迪斯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等政界、企业界精英都曾经就读于社区学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更是称“社区学院是美国的最佳特色”。美国大公司招聘人才也喜欢社区学院毕业生。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毕业生并不享有优势。中国最近决定逐步消除“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区别，这步棋是走对了。我认为，可以在河南省有选择地试办河南省社区学院，同国际主流社会的先进实践接轨。